

笑傲江湖空绝唱

凤凰网读书频道主编张弘评金庸其作其人

有家国情怀，也人情练达

□半岛记者 黄靖斐

曾和金庸有过接触的凤凰网读书频道主编张弘，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对金庸作品和其处世风格进行了解读。他认为金庸的作品前期写实，后期则比较“放飞”，但这可能是更真实的“金庸”。

张弘说金庸的小说都读过不止一遍，自认比较了解他，“年轻时读金庸的作品，会一下被书中个性分明的人物所吸引，他对人物的刻画，在武侠小说中没有人可以和他相比，古龙写人物写得好，但他擅长写男性角色，对女性角色的认识不够深刻。金庸不同，他对女性的人物塑造更加鲜活。”人物形象鲜明，故事紧凑好看。

“年纪大了再看金庸，会看到很多，比如家国情怀，像郭靖、杨过、乔峰，都是‘为国为民，侠之大者’的最好呈现。”张弘认为，这可能和金庸的人生处境有关，“他经历过乱世，到香港又办报，那一代人身上的家国情怀是根深蒂固的，在他的作品中，‘家国情怀’也是一以贯之。”

“如果再晚一点看金庸作品，又会读出新意，比如看他最后一部长篇《鹿鼎记》，这部小说跟其他的不同，更接近人的现实。”有人说，每个男人心里都想做乔峰，现实中却做成了韦小宝。“人在现实中棱角渐被磨平，圆滑，通世故。”

在张弘看来，金庸不仅是武侠小说家，还是一个社会活动家，“金庸小说中的聪明人很多，比如黄蓉。金庸肯定是一个聪明的人，在小说中也能体现他的为人处世，也可以说他人情练达。”张弘认为，金庸不是一个书生气特别重的人，“他是一个综合体。”

2010年左右，张弘在北京举办的一个活动中见到了金庸，“他也是新闻人，给我的感觉就是前辈和长者的感觉。”有记者问他“武侠小说中的行侠仗义符不符合现在的价值观”，金庸笑说，“在那个时代，侠客不可能找到相关证据把坏人就地正法。”在张弘看来，金庸并不是口才特别好的人，但他会明确表达自己的意见，并不会含糊过去。

□半岛记者 黄靖斐

10月30日，武侠小说泰斗金庸病逝于香港养和医院，享年94岁。“飞雪连天射白鹿，笑书神侠倚碧鸳”，他以汪洋恣肆的想象力，写下15部经典作品，一遍又一遍地被翻拍成影视剧，让人百看不厌。无论是古稀老人还是热血少年，每个人的成长印记里都有金庸武侠划过的一笔。大众虽熟知他肝胆柔情的江湖笔，却鲜识他为国为民的家国情。30日晚，著有《金庸传》的历史学者傅国涌接受了记者采访。

曾经报人

黄金时光都在从事报业

“金庸去世了。这是值得悲伤的一件事情，这是一个时代的结束”。傅国涌的《金庸传》一改“以往的《金庸传》作者们无一例外的仰视之姿”，而曾经引起过大众关注。在接受记者采访时，回忆起这位自己书中的“主角”，傅国涌感触颇多，“他的作品仍然会牵动千千万万的读者。金庸生活的近百年当中，对这个民族，对这个世界怀抱过梦想，是将这些梦想付诸过实践的一代报人，一代武侠小说作家。金庸的离去毫无疑问将引起人们对他更多的追问、关心和思考”。

谈到金庸的武侠小说，傅国涌说，“想起15年前酷热的夏天，在杭州，他对中央电视台《新闻夜话》的主持人说，将来他的墓碑上会写着这样一句话：这里躺着一个人，在20世纪、21世纪，他写过几十部武侠小说，这些小说为几亿人喜欢。”

在傅国涌眼里，金庸不仅仅是一个武侠小说家，更是一个报人。“遥望上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，金庸写下的14部武侠小说，曾经

让多少读者如痴如醉，但更重要的是他在1959年到1989年的30年间，创办的香港《明报》曾经影响过那个时代的中文世界”。傅国涌评价，“金庸亲手执笔，写的那些社评，也影响过许多的读者。金庸的汉语干净朴素、明白，也常有深刻之处。早在少年时代，金庸在《东南日报》上发表的《一事能狂便少年》、《人比黄花瘦》、《千人中之一人》，这些文章就显现出了他在写作上出色的才能”。

在傅国涌看来，金庸的文字在中学时代，就已经相当老练，“他的思想在那个时代就开始成形。经历了艰苦卓绝的抗战岁月，他1948年来到香港，在新闻界工作，他一生大部分的时光都在从事报业”。从杭州《东南日报》、上海《大公报》、香港《大公报》、《新晚报》，到自己创立《明报》，把《明报》办成了一个报业集团，这大半个世纪中，金庸成为了华人世界傲然独立的一位报人。“所以他留在新闻史上的影响，和他留在武侠小说史上的一样重要”。

文化成长

始终坚持一个报人的立场

傅国涌认为，虽然今日的大众更关心的是金庸风靡一时的武侠小说，而当年武侠小说不过是副产品，办报才是他的正业。我们知道他在报纸上发表的这些武侠小说只是为了扩大销量，只是为了吸引读者，而真正想传递给大众的，却是他在社评中表达出来的对国计民生以及世界风云的关切。“他是一个有才华的评论家，一手写社评，一手写武侠的作家，他的文字可进可退”。

在动荡的时代里，金庸提供了清醒的成熟的声音，“他不是那种莽撞的人，在任何的风云激荡中，他总有深思熟虑、理性的声音传递给读者”，金庸始终坚持他自己的一个独立报人的立场，而不是人云亦云。“这一点我非常欣赏他。”

金庸生逢乱世，少年时代就遇到了抗日战争，流亡到了浙江南部的丽水碧湖，在这里继续念完初中，念高中差一点被开除，又转学到了衢州山中的衢州中学。在成长的年代里，金庸就显示出了过人的才华，傅国涌介绍，“他读了很多书，包括万有文库在内的许多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书，都是他那个时代有影响力的书籍”。

金庸是在乱世中成长起来的一位四代书香门第的子弟。他生于海宁，祖上到康熙时代达到了最辉

煌的时代，直到他爷爷的时代，还是进士，“他在一个没落的士大夫阶层的家庭里成长，他身上有中国文化深厚的积淀，又读过新式学校，饱受了中西贯通教育给他的滋润。”

傅国涌认为，金庸的武侠小说虽然是娱乐作品，却可以直接追溯到清代的公案小说和侠义小说，远追到唐人传奇，追得更远的话，一直可以追到司马迁的《刺客列传》，更不要说他读得如痴如醉的那些民国新武侠小说。在上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，金庸将武侠小说的传统进一步发扬光大，创造了武侠小说史上的一个顶峰。“他的文字如此之干净、生动，完全是母语的典范，放在整个100年的中国白话文的序列里，都是毫无争议的，无论是他的社评，还是武侠小说”。

金庸

(1924-2018)

先生远去
侠留人间

[A18-19]

2018年10月31日 星期三

责编 刘礼智
美编 张怀博
值班主任 刘宜庆

